我记忆中的高亦兰先生

○马国馨（1965届建筑）



高亦兰先生

我国著名建筑教育家、杰出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亦兰教授，因病于2026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高亦兰，1932年3月3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陕西米脂。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后跟随苏联专家攻读研究生，1953年留校任教。1988—1992年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

高亦兰教授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现代建筑学学科建设与建筑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她曾参与或主持过多项重大设计项目，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主楼、毛主席纪念堂、燕翔饭店、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校园改扩建规划、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图书馆等，在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若干关键节点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创作印记。

我们敬爱的高亦兰先生，于2026年6月11日晚6时去世。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们同学这里，因为就在一年前校友返校日，我们建五班庆祝毕业60周年的纪念会上，高先生还特别坐了轮椅前来参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且特别强调：“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参加同学们的公众集会。”果然，今年建六班的毕业60周年纪念会，高先生就没有出席。想到这里，我们更是充满了对先生的怀念与敬爱之情。

林贤光先生在知道高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后，曾在我们班的微信群里留下一段文字。他说：“高老师与我同龄，又是我到建筑历史教研组当助教认识的第一位同事，后来又曾在基建会和系行政两度共事。深谙高先生学艺精湛，直爽坦率，执事求速求精，公正廉洁，是我深深敬佩的学长。她的离去，不仅是建筑学院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讣告中写道：“高先生毕生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慈严兼济，春风化雨，立德树人，师表垂范，广为学界和业界所敬仰。”

严格说，我和高先生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在大学六年的学习中，她从没有教过我。工作以后有一些接触，但都时间不长。我和她的联系，更多的还都是电话或者短信，所以对先生的情况也还是了解一些。在学校时我很早就知道了高先生的名字，那是因为大一学建筑初步学习西洋柱式之后，很快我就在东安市场买到一本建工出版社出版、由俄文转译的介绍西洋柱式的《古典建筑形式》一书，这本书是由陈志华和高亦兰两位先生合译的。虽然那时并不认得两位先生，可是名字已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象。后来高先生的老伴刘鸿滨先生教过我们工业建筑设计，以至

在毕业前的1965年，在四川绵阳“651工程”时，刘先生也和我们长期日夜生活、战斗在一起。但和高先生交流比较多倒是在毕业后，甚至是70年代之后。

和高先生第一次交往是在1976—1977年的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毛主席1976年去世以后，按照中央指示，很快于9月14日在前门饭店成立了由北京和全国各地专家组成的方案设计组。当时清华大学参加纪念堂设计组的有吴良镛、王炜钰、高亦兰和徐伯安四位先生。我的爱人关滨蓉作为铁道兵系统设计人员也在设计组。当时方案组的女同志不多，王、高二先生住一间，关滨蓉和张锦秋住一间。其实在此之前，北京建筑设计院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当时北京院有徐荫培、方伯义、吴观张等人长住饭店，我们则在院内做各种后勤准备工作，并且也时时到前门饭店旁听各地专家的方案讨论会。专家组主要是研究纪念堂的选址和提出各种设计方案，大概在一个月以后，10月21日各地的专家就回去了。

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在10月14日正式成立，设计组以北京建筑设计院为主（工程主持人和专业负责人都由北京院的技术人员担任）。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工艺美院和建筑雕塑厂的人员参加，并搬到天安门现场进行现场设计。清华的几位先生中，吴良镛先生在总图组，高亦兰、徐伯安二先生在立面组，王炜钰先生在室内装修组。我是平剖面组的，所以我和他们不在一个小组。但因为设计组是在一个大屋子里办公，所以讨论会也常见面。高先生办事风风火火，讲起话来声高语快，这正好和王炜钰先生的慢声细语形成了鲜明对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纪念堂最后平面方案的确定、立面方案的提出，都是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后，经由上级批准的。最后几轮方案的表现图和立面细部等，高亦兰先生和徐伯安先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亲自执笔绘制了表现图。

我在把纪念堂的基本图纸完成以后，就一直在工地和六个施工单位以及加工厂家打交道。在现场也经常遇到各位先生对已经施工的部分进行讨论。吴良镛先生对立面上的琉璃檐口曾提出过看法。高先生有一次和我在现场，她告诉我：“小马，你发现没有，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都是重檐，像天安门、太和殿都是重檐，而这次的纪念堂也是重檐。两侧不在轴线上的大会堂、博物馆就都是单檐！”我一想果真是如此。这种形制和级别上的主次区别，高先生很敏感地一下就发觉了，可是在我们当初做设计时，还从没有人主动思考过这一点，这也可能是一种潜意识。记得当时赵鹏飞主任还特别提出，一定要用重檐。在近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前的咨询过程中，为了突出天安门广场新建筑群对传统形制的继承，我们也曾强调了这个观点。

到了工程后期，我们都还在为收尾工程忙乱。高亦兰先生已经受设计组委托，整理了一篇《毛主席纪念堂建筑设计方案的发展过程》，和其他总结文章一起发表在1977年第四期《建筑学报》的纪念堂专刊上。但当时在前门饭店那些过程方案因为对施工没什么作用，所以都散放在设计室里，也没有人管理。高亦兰先生看了后觉得这是很好的教学资料，丢了很可惜，于是自告奋勇把这些图纸都收集在一起。后来还把这些资料都拍了黑白照片。这些资料在她手里放了二十多年，到2002年，



高亦兰先生（前排中）与同事们在毛主席纪念堂前留影，前排左为吴良镛先生

因为清华建筑历史教研组的同志催促，加之学报的文章受篇幅所限，许多细节也都没有讲得更清楚，于是高先生又另外专门整理了一篇非常详细的长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过程总结》，发表在2003年《建筑史论文集》第一期上。由于有1977年总结的基础，又有大量当年的方案图，所以这份总结可以说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总结文献了。

记得1984年5月在广州，《世界建筑》杂志主办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刚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在会上作了一个学术发言：《从两个饭店的设计人看日本建筑界的一些动向》，后来把发言整理后在《世界建筑》上发表了。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高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打电话说：“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利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一个学术问题，我已让我的研究生们都要看看这篇文章。”高先生的肯定和热情鼓励，也增加了我的自信和勇气，为后来继续发表学术文章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繁荣建筑创作、加强学术交流，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了建筑创作和理论委员会。1989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成立后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组织。高亦兰先生是这些组织的成员，我是后加入的，所以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也就多了一些。

1994年11月，在长沙召开学术讨论会之后，参会者去张家界等地考察。这次会议去了不少建筑界的前辈，有刘开济、罗小未、彭一刚、关肇邺、聂兰生和高亦兰先生等人，而年纪最大的是张开济总建筑师，那时他已经82岁了。于是我们这些年轻后辈纷纷和他们合影留念。记得高亦兰先生当时也和张总一起，由我给他们照了一张相，张总在拍照时大声说：“我就愿意和美女照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实际上大家并不理解，这是张开济总在对自己受冲击时的一些事情加以调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先生担任建筑系主任，行政事务很多。但是在我们校庆回校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她，她参加过我们同学的聚会，热情地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谈到系里的一些设想和变化。1999年她退休以后，因一些病痛和琐事，就很难脱身了。但是收到我们同学的贺卡和去信，高先生都会以她和刘鸿滨先生共同署名准时回信。正好那段时间我把过去一些文章收集成集子出版，每次出版后的新书，我都会快递寄给高先生一份，而她收到后，相隔时间有长有短，但都要和我打个电话，讲讲看书后的感想，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2017年1月21日，接到高先生电话，她说已经收到了我的书。同时说她已经85岁了，现在主要是走路不好，需要拄拐杖。刘鸿滨先生也马上就快90岁了，他腿脚倒好，就是爱忘事。也告诉我，孙子已经18岁了，并说了他的文化学习和每周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情况。在9月教师节给高

先生打电话祝贺节日时，高先生主要就讲刘先生的病情了。后来有几次寄出去，她收到后给我打电话，第一句常是：“我看书的速度都赶不上你出书的速度。”实际上是她为家事所累，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所以我想高先生不但人累，心也更累！

后来估计高老师更忙了，所以收到我的书就只来个短信。像2020年6月5日，当时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院70周年庆，我编了一本建院人肖像集，考虑到她可能认识其中很多老熟人就寄一本给她。先生收到后回信：“谢谢赠书，《建院人剪影》极有价值。”在2021年4月寄给先生一本打油诗，里面有小一半都是集前人诗句，先生回复：“谢谢赠书。你擅撰文写诗，集古 / 今人诗句，所提注释均很有用，增加了可读性。但可惜我视力渐差，不宜久读，只能慢慢来，是一憾事。”后来在同年12月，又寄给先生一本怀念逝去的应朝同学的纪念文集《朝华夕拾》，先生回了一封长信：“谢谢赠书。看了你夹在书中的亲笔信，方知应朝于三年前去世，不胜痛惜，《朝花夕拾》一书非常全面，既有他本人的论述、诗画，还有信札，另外有纪念文章多篇。足见建5班同学间团结、友情甚浓。”2023年10月24日，先生收到我的《东瀛札记》一书，马上回了“谢谢赠书”四字。到了2024年1月2日，因我的《东瀛札记》里边有一篇文章很有趣，但最重要的地方被删了，于是我把原文附上了。高先生读后答我：“房东一文已看过。好！”等到2024年8月3日，又收到我寄去的书时，回信就简单得只有“谢”一个字。想来先生真是累了！我寄给她的这些书，可能反倒增加了她的负担。



1996 年，高亦兰先生（前排左 4）和建五同学们在一起

对清华建筑系来说，了解建筑系历史发展的老领导、老同事，尤其是对建筑系早年的历史，留下自己系统回忆的人并不多，如刘小石、李德耀等主要党政领导都没有什么系统的回忆文字留下来。高先生也是清华建筑系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长期担任民用教研组的党支部领导和建筑系的系主任，指导研究生王蒙徽对梁思成先生的古城保护思想和规划思想进行过研究，发表过一系列学术文章，和郭黛姮先生、夏路等一起撰写了近50万字的《一代宗师梁思成》专著，系统整理了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并发表了专论。此外还留下了《谈清华早期建筑教育》（1995）、《30年后的回顾》（1998）等回忆文字。她退休以后也整理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过程回忆》（2002）、《设计院是建筑系师生重要实践基地》（2008）、《清华大学东区住宅》（2021）等回忆文字。但总体来说，她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做更多、更系统的事情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看来对还健在的老先生们的抢救性访谈、回忆整理真是迫在眉睫了！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高亦兰先生。先生的形象、作为和贡献，我会永远珍藏铭记！